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东亚病夫”的帽子早已不复存在,主要健康指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口身体素质获得巨大的提高。科教文化素质的提高更为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国际人文发展素质指数中的排位。然而无论身体素质还是文化教育素质,我们的总体水平还不够高,SARS使不够高的一面进一步暴露出来。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不仅指有无疾病,而且包括人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状态的完好,即生理、心理和社会状态全面的健康。SARS对人口身体素质是一个检验,检验抵抗病毒的能力;对人口心理素质也是一个检验,在传染病面前是否有一种健康的心态。无论开始时的满不在乎、麻木不仁,还是疫情严重后的惊慌失措、谈“非”色变,都是缺少科学精神、心理不健康的表现。至于乱丢废弃物、随地吐痰、对着人打喷嚏等不卫生习惯,疫病流行期间更成为一种道德问题,暴露出来的问题足以发人深省。就疫情防控而言,“社会状态完好”需要改进之处也很多。突出的一点是,多年来在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上欠账较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不够,以至疫病发生后措手不及。这说明,提高人口素质必须立足于立体层次,从人口个体来说,既有生理素质的提高,又有心理素质提高方面的问题;从社会发展来说,既有公民自身方面的提高,又有国家、社会方面的“组织完好”,个人和社会都应作出各自的努力。

这次 SARS 肆虐,值得格外重视的一点是,人口健康素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不可低估。过去常说,现代化建设科技是关键,基础在教育,对于人口文化教育素质分外重视,无疑是正确的。只是仅仅重视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还不够,身体素质提高的地位和作用应予充分注意。从理论上说,包括我们正在进行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内的现代化建设,人力资本是决定性要素;但对人力资本的诠释要全面,在决定人力资本的人的健康、知识、技能、经验中,不可忽视健康因素,健康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应当给予应有的肯定。用在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应当引起重视,是同教育等投资一样不可少,并且能够带来同等的效益。

北京市民对 SARS 疫情的风险认知特征 时 勤等*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我国政府为了抵御 SARS 的肆虐,紧急救治广大患者,在控制传染源、保护民众免受感染方面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使 SARS 疫情在短期内基本得到了控制。目前,我国政府及学术界已在考虑危机突发事件的预防监控系统的建立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危机事件的控制与预防系统(包括流行病传染监控、公共卫生政策系统)忽视了对民众社会心理行为的预防和监控,则不是一个完善的预防控制系统,我们的视角应该投向更为广大的正常人在危机事件中的社会心理行为,这就是我们主张的国家危机事件社会心理预警系统的主要的服务对象。因为真正受到流行病感染的仅为万分之几,而涉及 SARS 事件其他绝大多数正常人的社会心理行为受到的影响,千万不可小视。因此,建立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应对各种危机事件的社会心理行为预警系统,已成为心理学工作者务必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

北京市是此次 SARS 流行最为严重的城市,从 5 月上旬(危机事件发生过程中)到 6 月上旬(危机事件基本平息后),SARS 疫情从高发到下降,并逐渐得到控制,但还在波动之中,是抗击 SARS 攻坚战最为艰难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北京市民的态度、情绪状况和应对行为究竟如何?其变化有什么规律?哪些潜在的心理行为对后来的应对行为有预测作用?政府的哪些措施在引导民众梳理信息、理智应对方面是有成效的?需要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本研究正是选择了这一特殊阶段进行了追踪研究。

1 调查方式与问卷内容

在北京团市委及各区县青年志愿者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分别于 5 月 5~11 日和 5 月 27 日~6 月 7

* 本文其他作者有:陈雪峰 胡卫鹏 贾建民 高晶 李文东 范红霞 余俊生 张丽红

日两次对北京市 18 个区县市民进行了分层抽样,第一批取样发出问卷 7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674 份;第二批取样主要针对第一批被调查者发出问卷 674 份,收回有效问卷 582 份,损失样本 13.65%。最后,以两次均获取数据的 582 人作为基础样本进行了前后 1 个月的比较分析。调查主要包括了三部分:(1)疫情信息调查问卷;(2)风险认知调查问卷;(3)社会预警指标调查。

2 结果及分析

2.1 对疫情发布信息的评估

图 1 是民众回答“在您评估现阶段 SARS 的风险大小时,以下各种因素对您的影响程度如何?”问题时的评分结果。调查发现,总体看来,到了 6 月上旬,北京市民并没有因为疫情初步得到控制而降低风险意识。在最能引起民众风险认知的 3 种信息之中,新增死亡人数(3.35~3.42,分别为前后两次调查结果,下同)、医护人员患病人数(3.30~3.44)是市民两次评估中共同强调的疫情信息;不同的是,市民们 5 月上旬更关注新增治愈人数(3.30),而 6 月上旬则更关注新增发病人数(3.44)。上述评分均为 5 分等级(无影响、有较少影响、有影响、有较大影响、有很大影响),所得结果均介于有影响到有较大影响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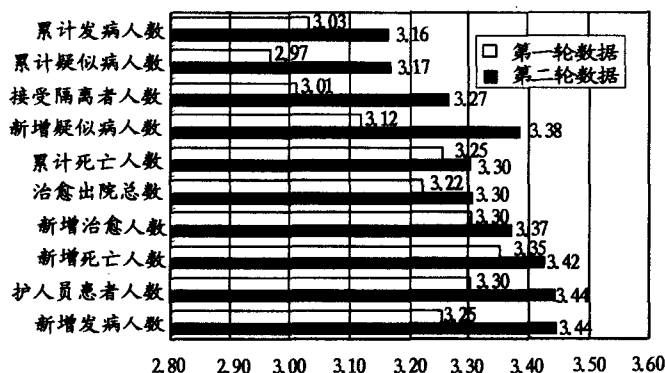


图 1 非典疫情发布信息源影响程度比较分析

还需注意的是,1 个月前民众比较忽视的疫情数据,此次风险评估分数有明显增加,它们分别是:新增疑似病人数(3.12~3.38)、受隔离人数(3.01~3.27)和累计疑似病人数(2.97~3.17)等等。可以发现,随着北京市 SARS 疫情得以有效的控制,市民们的风险认知倾向已更为理性化,更加关注疫情能否被控制的信息。

2.2 对周围环境信息的评估

在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方面,调查发现,两轮数据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从 6 月上旬调查的数据结果来看,环境因素信息的影响程度从高到低排列顺序为“所在单位和住宅区有无患者(3.43)”、“所认识的人有无患者(3.36)”、“同年龄组的人有无患者(3.10)”和“戴口罩人数的比例(3.00)”。这个结果再次说明,与日常生活和工作有关的物理空间距离越近的人发生的事情,越能增加人们的风险认知;但物理距离较远的公共活动场所人群的活动,容易被忽视。市民的这种认知状态恰好能说明麻痹意识和应对行为不当的心理原因。6 月以来,北京地区气温不断上升,市民活动已恢复正常,学生参加高考,外地人员入京务工明显人数大幅度增加。我们除了要求政府及各主管部门防控 SARS 的组织措施不得松懈,要求社会团体、企业和商业部门加强对公共场所的卫生环境、通风的保证之外,最为重要的还是北京每一位市民对于维护公共场所卫生环境的组织公民行为和社会责任。我们建议,务必在自觉坚持维护 SARS 时期养成新的卫生习惯、锻炼身体的同时,吸取国外城市 SARS 疫情反弹的教训,保护来之不易的疫情控制的成果,形成关心环境、维护公德的社会心理氛围,齐心协力,相互关心,共同防范不良行为习惯的回潮。

2.3 对政府干预行为信息的评估

调查结果表明,在北京市政府及各主管部门抗击 SARS 组织措施信息的评价方面,市民关心程度的第二轮评分总体略高于第一轮。其中,民众对“SARS 病毒传播渠道的封堵措施”这一信息源的关心程度略有上升(3.32~3.44),说明老百姓更为关注切断 SARS 传播渠道的具体、切实的防范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公交、水电、商场供应信息和对停课、放假等信息的关注程度在增加,对政府领导人的个人采访和谈话的关注程度也有所提高。此外,从亲友、家人和朋友的信息交流(2.88~3.27)、世界卫生组织对来本地旅游的公告(2.77~3.12)以及互联网的 SARS 信息传播(2.55~3.04),民众的关注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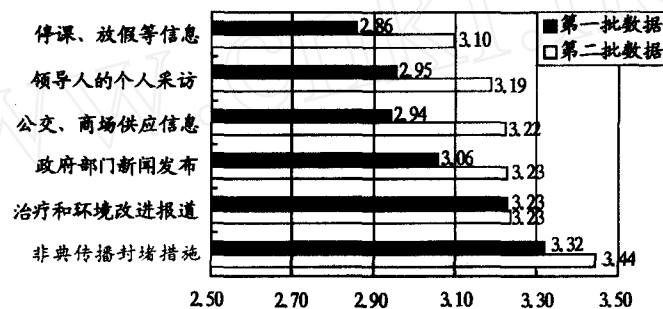


图2 政府行为信息源影响程度比较分析

进一步分析显示,不同教育水平的民众在“SARS 病毒传播渠道的封堵措施”信息源上所受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民众对该信息源的关心比高中以下文化程度民众所受影响大。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众在“亲友、家人和朋友的信息交流”及“互联网的 SARS 信息传播”信息源上所受影响也存在显著性差异,即 20~29 岁民众所受影响显著高于 40 岁以上民众所受影响。也就是说,年轻一些的市民更会受到亲友交流和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影响。

2.4 心理恐慌源的调查结果及分析

为了了解什么因素是导致市民紧张或恐慌的潜在的心理原因,我们选择了 10 个因素来考察市民对 SARS 疫情的恐慌心理的主要来源,它们分别是①SARS 病毒传染性强;②SARS 病毒快速致命性;③SARS 患者死亡率高;④康复后可能有后遗症;⑤致病原因不清楚;⑥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⑦广泛的新闻媒体报道;⑧周围人们的害怕和传言;⑨人人戴口罩,处处见告示;⑩来自互联网的多方面消息。

如图 3 所示,从前后两轮数据可以看出,导致或可能导致人们恐慌、紧张的心理原因主要是,SARS 病毒的传染性强(4.20~4.08),SARS 病毒的快速致命性(3.93~3.94),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3.95~3.83)等。这主要是由于目前国际医学界对 SARS 流行病了解和治疗手段还处在探索阶段,从而导致认识的不确定性。而较少引起心理恐慌的 3 个影响源分别是来自互联网的多方面消息(3.02~3.21);康复后可能有后遗症(3.16~3.27);人人戴口罩,处处见告示(3.09~3.27)。风险认知的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在危机事件中,民众感到不熟悉、不可控制的信息是导致心理不安和过度紧张的主要原因。本次调查获得的结果与这一结论基本一致。目前,北京市民普遍对于 SARS 流行病的病因、预防和治疗方法的不确定性、未知性感到担忧,这仍然是产生民众不安全感的潜在因素,也使我们感到有必要提示舆论媒体,在新闻报道的透明度和及时性取得进步的同时,要注意民众对于新闻信息的风险认知特点。新闻报道公开透明是非常必要的,但不是信息越多就越好,信息超过人们的记忆负荷,百姓难以甄别,也会导致紧张和恐慌。因此,新闻报道还有帮助老百姓梳理信息的责任,这才利于民众从容应对危机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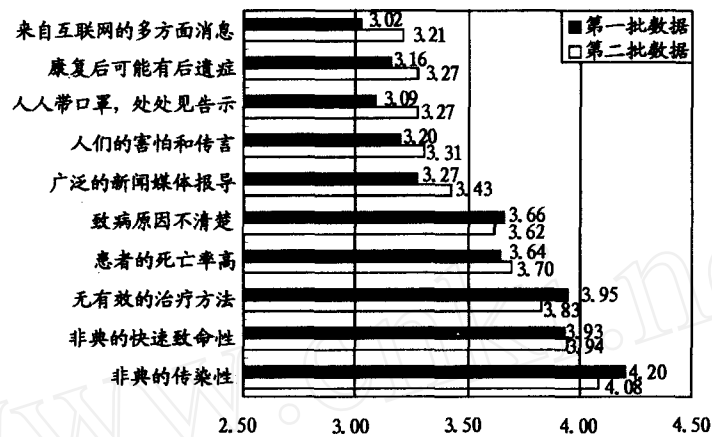


图3 心理恐慌影响源比较分析

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的风险敏感性和关注点是有差异的,调查发现,20岁以下未成年人与30岁以上成年人相比,对SARS本身特性(传染性、死亡率和快速致命性等)关注程度略低。20岁以下未成年人对传言和互联网等方面信息的关注程度要高于40岁以上的民众。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民众对SARS本身特性的关注却略低于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民众。

2.5 主要的社会心理预警指标总体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国内外风险认知和危机管理的研究结果以及我们有关社会心理行为的研究基础,本研究初步提出了SARS时期市民社会心理行为的6个预警指标。它包括3个负向指标:疫情风险认知、心理紧张度、疫情发展预期(越低越好)和3个正向指标:应对行为、心理健康和经济发展预期(即信心指数)(越高越好),对这些指标采用0~10分等级来评分。

图4可以看出,从5月上旬到6月上旬北京市民心理行为变化的一般趋势。

社会心理预警指标的调查结果显示,1个月以来,在负向水平的3个指标(越低越好)中,北京市民的心理紧张度在迅速回落的大趋势下略有回升(3.22~3.83),介于有点紧张感到有些紧张之间;对疫情能否得到控制的预期(4.36~4.18)介于患病率明显下降到接近正常之间,也就是民众认为疫情更能被控制了。不过,总体的风险认知仍保持在中等水平(5.17~5.25),并略有上升。这说明,北京地区SARS疫情控制形势从整体上在缓解了民众恐慌心理的同时,政府和媒体的宣传舆论使得多数民众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警觉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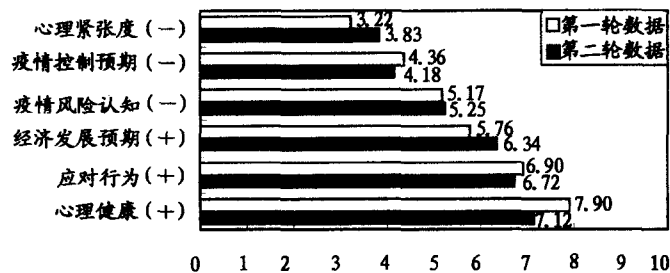


图4 社会心理预警指标比较分析

在正向水平的3个指标(越高越好)中,对于市民应对行为的调查结果发现,50岁以上的市民在保护性应对行为方面显著地好于30岁以下和40~49岁年龄段的市民。为此,需要提示中年期市民,不能因为工作繁忙而忽视了自我防护。值得注意的是,1个月以来,北京市民的心理健康自我评估出现了从7.90下降到7.12的情况,且这种下降达到了显著性水平(0.001)。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在面对

灾难事件发生时,人们会充分调动自己的潜能,保持一种亢奋状态以应对危机,等危机一过,某些应急状态下被忽视的心理问题就可能浮现出来。由此看来,因 SARS 流行病带来心理行为问题还不会在短期内消失,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心理咨询和辅导工作。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市民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指数有了明显的抬升(5.76~6.34,达到 0.001 显著性水平),即市民们对北京经济未来发展的评价,已经从 1 个月之前的“需长时间恢复”发展为“短期能恢复,影响小”。这说明,经过 SARS 艰难时刻的北京市民,已经对政府控制措施的效果表现出了相当的认可,对经济发展更加充满信心。

3 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在 5 月 5~11 日进行的 SARS 疫情中,在北京各区县市民社会心理行为的调查基础上,于 5 月 27 日~6 月 7 日再次完成了对 15 个区县 582 名市民追踪调查。结果表明:

第一,随着北京市 SARS 疫情得以有效的控制,市民们的风险认知倾向已更为理性化,更加关注疫情能否被控制的信息。

第二,与市民的工作、生活环境等物理空间较临近的环境发生疫情的信息,更容易增加人们的风险认知(即警觉性),同样可能引起病毒传染的公共场所的发病信息,市民的风险评估要低得多。

第三,SARS 的病因、愈后的复发和感染等不可控制或不熟悉的因素,是民众可能增加心理恐慌的潜在因素。

第四,社会心理预警指标评估结果表明,北京市民的心理紧张度在迅速回落的大趋势下略有回升,心理健康水平自我评估的下降情况值得关注,市民们对于北京市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指数有了明显的抬升。

第五,SARS 等危机事件中人的社会心理行为的预测问题,更多涉及的是人的风险认知及其社会心理行为研究,它属于社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和健康心理学的范畴,研究对象涉及到从个体、群体、组织到大的社区领域,甚至是国家、民族水平的社会心理行为。此类研究工作在国外早已受到高度重视,如美国的 FBI、密西根大学的 ISR 社会调查研究所、兰德公司、英国的战略情报研究所等机构,都有大量心理科学供我们参与预警系统的科研工作。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政府的角度,考虑如何建立国家级危机事件或重大事件的社会心理预警系统,使我国各级政府及与危机事件主管部门能及时监测个体、群体和社区,甚至整个大区域的民众的社会心理行为,从而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对策。它一方面可以预防因民众的行为不当带来的灾难,或者当危机事件发生后,立即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把损失控制到最小的程度;另一方面,通过科学的舆论引导或心理辅导,帮助民众梳理各种复杂的信息,克服在危机事件中的恐慌,以便从容应对。这次社会心理预警指标在 SARS 疫情中的使用已经初步显现出对于危机事件管理重要的意义。我们基于这些研究结果,已经先后向政府部门和新闻界发布了 5 期《SARS 社会心理预警简报》,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目前,更为最重要的是,如何把针对 SARS 的社会心理预警指标这一特殊性的研究拓展到更具长远意义的我国危机事件和灾难事件“社会心理预警研究”之中。

组织防“非典”全国农村流动人口调查的做法和体会 王 谦(国务院防治

非典工作督察组成员、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财务司副司长)

为配合全国农村防“非典”工作,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紧急部署全国计划生育系统进行跨省流入农村地区人口调查,各县通过专用网站向国家上报数据。这项工作从设计、部署到收集各地的数据、向国务院领导提交分析报告,不到 6 天,其中专用网站的建设仅用了 3 天。从 5 月 13 日首次调查开始,各地每 3 天调查、上报跨省流入当地农村的流动人口信息(包括流入人数、流入时间、流出省份、以及流入人口的性别、年龄、户籍状况等),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农村地区的、快速有效的流动人口